



「专访」江南文明是一部连续剧，马家浜就是扣人心弦的第一篇章

如今我们谈起“江南”，总伴着水墨画卷般的想象与“鱼米之乡”的富庶印象——但这一切究竟从何开始？

《马家浜与崧泽：最早的江南》一书的出版，将公众的视线引向了七千年前太湖流域的晨光。我们与本书作者陈明辉、王永磊研究员展开对话，探寻“最早的江南”如何从考古地层中浮现，其“饭稻羹鱼、以水为邻”的生存智慧，又如何为后世江南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石，并绵延至今，成为一份亟待激活的厚重文化遗产。

问：本书副标题“最早的江南”很吸引人，这也是一个有分量的论断。从考古学上看，马家浜文化被称为“最早的江南文化”或“江南文化之源”，其关键的考古学文化特征是什么？

答：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，最开始指长江以南，明清以来逐渐成为太湖流域的代称，马家浜文化作为太湖流域最早的文化，堪称最早的江南。

马家浜文化的特征：环太湖文化的奠基时期，为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社会发展水平还较低，但晚期也出现了社会分化；有了水稻耕种和家猪饲养，且马家浜文化晚期稻作水平已经较高；玉器制作、原始艺术和宗教处于初步发展状态。

问：简单来说，马家浜文化与更早的上山文化、跨湖桥文化等相比，发生了哪些质变，使得“江南”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明形态得以确立？

答：上山和跨湖桥（文化）主要分布在浙江中部的山区，马家浜（文化）位于平原，且靠大江大河，有利于大文化、大城市、大文明的出现。上山和跨湖桥（文化）是浙江本土文化，马家浜文化则很大程度上与北方文化密切相关（北方人群南迁），文化交流对于文化和文明发展非常重要。

马家浜文化时期，稻作农业支撑起了聚落生活，可以说，从“利用水稻”到“依赖水稻并围绕其组织社会生活”，是“江南”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的关键一跃。

问：近期东方卫视正在热播纪录片《大江南》，也在追溯“江南一万年”，其中也有以稻作、治水、定居为主线。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的实证，也为纪录片的史诗感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石。您觉得我们的考古研究与这类大众传媒的宏大叙事，在揭示江南文明起源上，如何互为印证、彼此深化？

答：考古研究与《大江南》这类纪录片是相辅相成的。考古学提供坚实的实证“点”和“线”——具体的遗迹、器物、年代序列，确保叙事不偏离科学事实。大众传媒的宏大叙事则将这些点线编织成生动的历史“面”和“情感”，构建公众可理解、可共鸣的文明史诗。

考古学的研究为纪录片的“史诗感”提供了基石；而纪录片的热播，又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，吸引更多人关注江南源头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。

问：纪录片提到“四大发明”之前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“人工驯化水稻”。马家浜文化中发现的大规模稻田遗存，也确立了“饭稻羹鱼”的生存模式，这对江南文明的奠基具有怎样的意义，是不是也重塑了这片土地的发展轨迹？

答：“饭稻羹鱼”模式的奠基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大规模稻田遗存的发现，证明马家浜先民通过大规模种植水稻，将稻米发展为主要食物来源，奠定了稻作文明的基础。这不仅仅是找到了“饭碗”，更是彻底重塑了这片土地的发展轨迹。稳定的食物生产使得人口得以聚集、财富得以积累，技术（如制陶、琢玉）得以专精，社会复杂化进程由此启动。江南从此告别了被动适应自然的状态，开启了主动改造环境、创造文明的新纪元。

问：“水”是江南的灵魂。马家浜先民的干栏式建筑、聚落布局和器物（如独木舟），体现了怎样独特的适应水环境的智慧？这种“以水为邻”的生存模式，您觉得它如何形塑了后世江南水乡的空间格局与文化心理？

答：“以水为邻”的智慧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干栏式建筑直接应对地下水位高、潮湿的问题；聚落多选择湖沼边缘的台地，既便于取水、渔猎和灌溉，又规避水患；独木舟的发明拓展了活动与交流范围。这种生存模式，从空间格局上，奠定了后世江南水乡“枕水而居、河街相邻”的雏形；从文化心理上，孕育了江南文化中灵活、通达、精细、注重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特质。

问：江南并非天生宜居，纪录片《大江南》就强调，江南的“好”源于先民“万年耕耘、千年搏浪”的坚韧。江南从汪洋泽国变成田园水乡和山村，我们的先民在开拓这片“卑湿之地”时展现的创造力与适应性，是否可视为“江南精神”最早的火种，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？

答：是的，从“汪洋泽国”“卑湿之地”到“鱼米之乡”，绝非天生，而是万年耕耘的结果。先民在开拓中展现出的因地制宜的创造力、坚韧不拔的适应性，可以说是“江南精神”最早的火种。这种精神内核——在不优越的起点上，通过智慧与勤勉创造出最美好的生活——对今天的我们，无论是面对科技创新、城市治理还是人生规划，都有着深刻的启示：真正的“好”，是奋斗和创造出来的。（下转10版）

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，我们沿着文脉向上追溯，穿过千年运河，越过吴越烽烟，会在嘉兴这片土地上，遇见七千年前提笔写下“江南”的文明原点——马家浜文化。

“马家浜文化确实可以说是‘江南文化之源’或‘最早的江南文化’。”

近日出版的“浙江一万年”丛书《马家浜与崧泽：最早的江南》，翻开了一段跨越七千年的江南往事。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成果、浙江省“理论研究传播行动”重点丛书的有机组成部分，“浙江一万年”丛书由《上山》《跨湖桥》《河姆渡》《马家浜与崧泽》《良渚》五部著作构成，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讲述浙江万年历史，梳理文化、文明发展轨迹，明晰史前浙江文化演进谱系。

这是浙江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的首次系统呈现，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浙江贡献的集中展示，也是浙江考古学人首次尝试以普通读者为主要受众撰写学术著作。

其中，《马家浜与崧泽：最早的江南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明辉、王永磊联袂撰写。两位作者长期深耕环太湖地区史前考古，专注于马家浜、崧泽文化谱系与文明化进程研究。

马家浜文化因1959年嘉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得名，年代约距今7000—5800年，主要分布于环太湖地区，是崧泽—良渚文化的源头。考古人员认为，马家浜文化为探索江南文化之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他们的考古之笔中，环太湖流域史前先民最真实的生产与生活，成为我们回望“最早的江南”时清晰的坐标。

马家浜文化，正是太湖流域的“原住民”留下的文明印记。让我们跟随考古学的发现，穿越时空，看看最初的江南是何等模样。

「鱼米之乡最早的基因」

最初的江南，是从一粒水稻里长出来的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一个深刻影响后世的的文化模式已然开启，那便是“饭稻羹鱼”。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，距今约7000年，是人工栽培的水稻，也是马家浜文化中年代较早的稻作遗存。

除了耕种，渔猎与采集仍是先民重要的食物来源。遗址中出土的骨鲛、骨鱼镖、陶网坠，以及大量鹿、野猪、水牛的遗骸，共同勾勒出一幅生动而立体的生计图景。

考古人员认为，以罗家角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早期，生计形态以渔猎采集为主，兼有稻作农业和家畜饲养。

稻田考古和植物考古取得重要突破，考古人员发现在马家浜文化晚期，普遍出现水稻田，有些水稻田面积还很大。

随着水田出现，稻米在先民食谱中占据了主要位置，标志着江南稻作文明走向成熟。除水稻外，遗址中还发现少量粟类遗存，证明早在七千年前，南北方已存在人群与作物的交流；芡实、菱角、梅、桃、甜瓜等野生资源，也仍是先民重要的食物补充。那时候先民获取肉食主要靠狩猎，同时还养猪和狗。

水田和配套的灌溉遗迹，共同诉说着一个事实：早在七千年前，这里就已形成稳定的稻作农业，为日后的“鱼米之乡”埋下最早的基因。

寻找最早的江南



■记者 许金艳 陈苏

嘉兴醉江南
红船起航地

Where the Red Boat Sets Sail
The Birthplace of Jiangnan Revivals

「玉文化的先河」

最初的江南，是匠心初兴、社会文明的先声。这水与土孕育江南的稻作文化，也在先民们的指缝间揉捏，盘筑成一件件造型古朴的陶器。

陶釜、豆、盂、鬲，承载着先民们朴素的日常。从泥条盘筑法，到慢轮修整、渗碳工艺，水、土与火完成奇妙的魔术，将平凡的泥土变成夹砂陶、黑陶，变成马家浜人的印记。

在《马家浜与崧泽》中，就以炊器由釜到鼎的变化将马家浜文化分为早期与晚期。

当石器、骨角牙器、木器被赋予形状和灵魂，手工业发达起来。

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建筑木构件转角方正，那是火烤和斧、锯砍劈的修整，土层中被小心发掘出的细长纤维捻的绳子和织物，正是先民们编织与纺织技术的见证。

「人心可以栖居」

最初的江南，是初绽的美学滥觞、信仰寄寓。日日与草木鸟虫相伴，先民们一点点探出审美的触角，形成江南史前美学的滥觞。此时，艺术带着原始的韵味。

罗家角遗址出土的带脊釜的口沿脊上，米点纹细密得像落下的雨丝，三叶纹舒展着草木的气息，斜线纹、弦纹、戳印圆圈纹，刻画着先民对美的朴素追求。

马家浜人似乎天生懂得形式的美，那些多角形的盘、豆，棱角分明却又对称自然，有人说这是几何的朴素追求，也有人说，那是对太阳的崇拜。

他们观察自然，模仿自然，那些人和动物的陶塑，蕴含先民们最初的思想意识与情感寄托。

马家浜遗址出土的“人面陶器耳”，带着朴素的“自然情结”。

那些精美的玉玦、玉璜、象牙梳，

从一粒稻开始，到依水而居的家园；从文明社会先声，到艺术与信仰初萌，最初的江南，是一脉相承的文明基因。

马家浜文化以七千年的积淀，奠定江南文化最深层的基因，它下启崧泽，接续良渚，在环太湖这片土地上，勾画出一条清晰而完整的文明演进之路。

嘉兴醉江南，不止于烟雨风光，更在于这七千年不曾断流的文明底气。这里是江南文化之源，是最初的江南，也是永远的江南。